

叶君健全集

第八卷 长篇小说卷(五)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叶君健全集

第八卷 长篇小说卷(五)

北 京

第八卷出版说明

本卷收入《寂静群山》三部曲之三《远程》及长篇小说《白霞》，并附有《〈寂静群山〉后记》及《〈白霞〉后记》。

《远程》的创作、出版情况，在第六卷中已作了交代，这里不再说明。

《白霞》作于一九九三——一九九四年，由华文出版社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出版。此次选入全集，即采用这一版本。

目 录

《寂静群山》三部曲之三 远程

一	2
二	20
三	36
四	49
五	72
六	88
七	103
八	124
九	143
十	158
十一	175
十二	193
尾声	214

《寂静群山》后记	217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白 霞

一	222
二	231
三	242
四	251
五	260

六	284
七	291
八	306
九	314
十	319
十一	325
十二	330
十三	336
十四	344
十五	352
十六	367
十七	380
十八	388
十九	400
二十	418
二十一	422
二十二	427
尾声	437
《白霞》后记	440

《寂静的群山》三部曲之三

远 程

潘大叔和我回到葵花婶家的当晚上，乡里响起了一片炮竹声，热闹的程度，很像除夕，虽然时间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多月。潘大叔来到由我母亲的睡房临时改成的产房，兴奋地看了一下阿兰和她新生的那个“放牛的胖娃娃”，然后就回到堂屋里来。他看见我的母亲、葵花婶和杏嫂正在忙着缝婴儿的衣服和尿布，乐得简直说不出话来。他那布满了皱纹的面上堆满了笑，他回来时那对泪汪汪的眼睛也射出幸福的亮光。

“我能帮点忙吗？”他对三位母亲说，声音略带歉意，“只是我的手指太粗、太秃，拿不住针。”

“是的，你能帮忙，”我的母亲说，指着屋子上首的香案——那上面除了给祖先的供品外，还有新煮的庆祝婴儿出生的一大盘红蛋，“帮忙把它们消掉几个吧。祖先已经尝过了。”

母亲的声音也好久以来没有像这样松快过。

潘大叔也实在饿了。我知道，他头天只吃了一顿饭，这天他连水都没有喝过一口。我连忙捧了五个红蛋给他。他顺势在一个三脚凳上坐下来，接过红蛋，但他的眼光却盯着屋子上首的神龛。

“大娘，”他嗫嚅着说，“这是什么时候，您还这样相信祖先？”

母亲的面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。

“怎的，你们闹革命，连祖先都不要了？”她反问着，“没有祖先的保佑，你们还能这样安全？阿兰还能生出这样的胖娃娃——而且是个放牛的胖娃娃！我们还得请求祖先保佑他长大成人呀！他也是你的孙子呀！你不关心他的成长吗？”

潘大叔微微地低下了头。“孙子”这个词掀起了他的想象，他又把头抬起来，用兴奋的声音说：

“大娘，您说的是真话吗？对，他应该说是我的孙子。阿兰是我亲眼看

着长大的，我一直把她当做女儿一样看待。至于老刘嘛，我早些时喜欢听他说书，现在也喜欢他干事麻利，虽说他是同志，但我总觉得他要算是我的女婿。您说对吗，大娘？”

我的母亲点了点头。但葵花婶和杏嫂都笑了。

“你对你孙子的未来有什么打算？”葵花婶逗趣地问，“放牛？还是像你们一样——改行干革命？”

潘大叔努了一下嘴。

“当然放牛啰，”他说，“我们究竟是种田人呀，干革命是出于时势的需要。他长大了，就没有这个需要了，因为国家将是公有制，他自己将是田地的主人——自己当主人，那该多快乐！”

“那么就叫他快乐吧——我们正在想给他起个名儿。”杏嫂插嘴说，“他现在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新人，该有一个名字了。”

潘大叔连连点头，发出一声声称赞：

“对！对！不然怎么叫他？我看‘快乐’这个名字很合适。我一生只有一次‘快乐’，那就是昨天发生的这件喜事：庄稼人夺下了县城，我这个老单身汉有了孙子。您说呢，大娘？”

母亲笑了，说：

“你说得很对。这个名字还有另一层意义，纪念你。潘大叔。”

“我太高兴了。”潘大叔说，站起身来，“但是这样一来，我的责任也加重了。我得加倍地工作——为了下一代！我得回县城去，耽误的时间已经不少了。”

那五个喜庆的红鸡蛋，他一个也没有来得及吃，便揣在怀里，向屋外的暮色中走去，一边喃喃地自语：

“得让老刘知道自己生了一个胖儿子——他险些也成了一个老单身汉！”

外面的炮竹声仍然没有停息，只不过已经变得稀薄、零星，暮色已经转成了夜色。几位母亲知道潘大叔的工作担子重，责任心也强，只好默默地望着他离去——虽然我们担心他走夜路会不会跌跤，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年轻人，视力也没有早年那样好。杏嫂拉着小秃——他已经伏在她膝上睡着了，也站起身，准备离去。我得向络腮大爷和何硕儒汇报这几天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情况，所以也陪她一块回去。

何硕儒这一阵子没有太多的事做——因为老刘和我都不在，干别的任务去了。我猜想他一定会闷得发慌，但我一走进他的房间，房里却是空无一人，好像他已经离开了好几天，果然不错，身后有个声音传到我耳边来：

“何硕儒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！”

我掉过头来一看，正是络腮大爷站在我后面。

“大爷，我正想要对您汇报我这几天的情况。”我说，“您一定很惦记我吧？”

“可不是，”络腮大爷说，“我也去了县城，刚从那里回来。你的情况纪青已经向我讲过，你不须汇报了。你知道，我也参加了农民自卫队——是个临时队员。我虽然打不了仗，但总会发出几声吆喝——助助威呗。”

“何硕儒呢？”我问，“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走后的第二天，老刘就匆匆忙忙地赶来，把他领走了。”络腮大爷说，“他临走时兴奋得不得了，说他这一阵子可以活动活动了。在红土岗这个小村里过清静日子，他开始不耐烦了，感到‘不好意思’。”

“怎的？”我问，“他也参加了农民自卫队？”

“他不是农民，”络腮大爷说，“他是知识分子。他只能干他的本行，配合老刘就地搞宣传工作——当场编歌词，老刘组织的临时宣传队当场把他的歌词传送到各个自卫队中去，鼓劲呀！你以为夺取县城那么容易？鼓劲不可少呀！”

“那么现在他可以回来了？我正要见他。”

络腮大爷摇了摇头。

“恐怕一刻回来不了，他的头脑变得比老刘还热。”他说，接着便降低声音，但语气更严肃：“你知道，他参加革命了——这两天许多积极分子都要求加入组织，正式干革命——他属于最先提出申请的几个人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宣誓了？”

“是的，他是一个同志了。老刘和纪青是他的介绍人。”

“那么他就不再需要我伺候了？”

“我看也是这样。”络腮大爷说，作出一个微笑，“他已经不再是个少爷，他成为了无产阶级战士了呀！但你还得呆在这里，听候新的安排。我想很快你就会得到通知——或者我得到通知。等着吧。”

看来我真的可以休息几天了。络腮大爷还没有吃晚饭。他面上虽然充

满了兴奋的神情,但还是掩盖不了疲劳,一头蓬松的白发更衬托出他的形容枯槁和憔悴。他比我更需要休息。我趁杏嫂送小秃去睡觉的当儿,到灶房去点燃炉火,先烧一锅热水,让他洗洗脸和脚。杏嫂安顿好了孩子,也接着出来,为他做饭。我觉得再没有什么可以插手,便返回到我的母亲那里去。

母亲仍然处在一种激动、兴奋状态之中,毫无睡意,虽然葵花婶已经回到自己房里休息去了,而且通过那半掩的房门,我还听到一个有节奏、微弱的鼾声隐隐地从那里飘出来。她真是一个神经健全的婶婶,天塌下来她也不大在乎。虽然子仲叔和纪青一直有好多天没有回来,她却仍然能够睡得很好、很熟。这大概是多年锻炼的结果。虽然外面弥漫着欢呼声和炮竹声,她丝毫不为之所动,仍然在这个偏僻的小红土岗村过她正常的、安静的生活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子仲叔和纪青才能在外面安心地展开他们的活动。

我的母亲也似乎无形受到了她的感染,不太在意远方飘来的、但逐渐变得稀疏了的人声和炮竹声。但她却没有睡意,随着夜的进展,她看来变得越来越有精神。她一会儿忙着为新生的婴孩做针线活,一会儿停下来倾听里屋里阿兰的动静。阿兰似乎感到很烦躁,不想静静地躺在床上,恢复她在分娩过程中生理上所遭受到的损失。我们可以听到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的窸窣声。也许她是太不安宁了,惊动了孩子,我也听到他发出的呜呜的哭声。忽然间,一支即兴的催眠曲隔墙飘了过来:

小快乐哟,小快乐,
好好地睡觉,
等你醒来时,
你的爸爸就会来和你逗乐……

声音是那么低微、柔和,充满了母爱。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,它是出自阿兰之口,因为这是她的声音。我的母亲脸上隐现出一个满足的微笑——笑得是那么温厚、柔和,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她也用低微的声音对我说:

“瞧,我们在外面讲的话她全都听到了,潘大叔给孩子起的名字她不仅听到了,还接受了,现在还叫出来了。从今以后我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‘快乐’——尽管现在作这样的妄想还早了一点。”

“这已经不是妄想了!”我说,“您瞧,潘大叔该多么有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他的心变得年轻了，”母亲说，“年轻的心总是充满希望的。让我们希望吧！啊，阿兰是不是累了？她的声音停止了。快乐也再没有哭了。要不要送点东西给她吃？”

我拿不定主意，没有回答。母亲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的，她得吃点夜宵。坐月子的妈妈就得多吃！这样才复元得快。”于是她到锅台那儿去，煨了一碗细面。她小心翼翼端着它走进阿兰房里去，我在后面跟着。阿兰立刻划根火柴，点燃床头旁边的油灯。她不仅显得不累，而且看上去还特别精神。

“您太费心了，妈，”阿兰说，“现在还守着我！这样下去，您也要累垮了。我得赶快回到县里去，这样热气腾腾的时刻，要做的事那么多，我不能只是躺在这里想着我个人。”

一股阴沉的气氛又重新掠过母亲新近才解除了忧戚的面孔。但是她仍然做出一个温和的微笑，说：

“把这碗细面吃了——慢慢地吃吧。只有你吃东西，我才感到高兴。”

母亲静静地望着她，要亲眼看她吃完才离开。我也站在一旁不动。阿兰只好捧起面条吃了。在我小时的记忆中，阿兰总是胃口好，有多少东西都吃不够。现在她却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斯文，吃得慢，一边吃，一边似乎在心里想什么事情。在灯光下，她的面孔虽然仍是那么消瘦，但却变白了，她早年不幸害天花落下的一脸麻点，似乎也消失了。几天的卧床，她竟又变成了一个美人儿——这真是意外！我的母亲也似乎看出了这一点。她的盯着阿兰的一对老眼忽然射出幸福的光芒——这又是另一个意外！

她吃得很仔细，连一滴面汤也没有留。她大概也发现母亲神情的变化，想借此更增加她的愉快。但她把碗递给母亲后，却发出一个坚定的声音，说：

“我想明天就可以下床。我得赶到县城去，我不能当革命的逃兵！”

母亲收敛起她的微笑，变得严厉起来。

“什么话！”她说，“潘大叔今天还说过，革命就是为了下一代。这样一个漂亮的孩子，你能扔下他不管？谁喂他的奶？”

阿兰说不出话来。为了避免母亲的视线，她掉过头去，静静地望着正在熟睡的“快乐”。房间里出现了一种郁闷的沉寂。在这沉寂中我们离开了阿兰。但在走出房门前，母亲补充着说：

“我是个旧式的妇女，如果我的话不合适，那就算我没有说吧。但我是做母亲的过来人，我有我的责任感。没有满月以前，我不能让你出门！”

母亲从没有说过这样严重的话。阿兰大概也开始懂得了母亲的心：“孙子”虽然姓刘，但阿兰究竟是她倾注了全部的爱和关怀培养大的，像亲生的女儿一样；她的孩子母亲在感情上自然也会当做自己的亲骨肉。阿兰暂时只好没有再作声。她得遵守母亲的家规。

但是她的内心却在变得更为不安起来。她迫切地想要了解，农民夺得了县城以后形势所发生的变化。起义不过是一种手段，而不是最终的目的，还有一系列更重要的工作得做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她不能脱节，得投身进去。但领导会分配给她什么工作呢？只有老刘能告诉她。她一直盼望她这位主管宣传工作的丈夫能回来看看她。潘大叔肯定已经告诉了他，他已经当了父亲。这样喜庆的消息还不能催他回来看一眼自己的儿子，那一定是因为他分不了身。一想到这里，阿兰就更感到坐立不安了。

但是有一天，当阿兰正站在窗子旁向远方眺望的时候，她忽然拍起掌来。母亲和我立即猜想到，她一定看到什么可以使她变得如此兴奋的事情。我们连忙跑到门外，原来是老刘回来了。他虽然瘦得像个幻影，穿着一身还是初秋穿的旧夹长袍，更显得清瘦，但是他走起路的样子仍然是风度翩翩，不减当年说书人的潇洒本色。他一见到我的母亲，就深深地鞠一躬，说：

“辛苦您了，妈妈！亏了您的照顾，我这些天得以安心在县里工作。”

“你再晚回两天，”母亲说，“阿兰就要急病了！什么工作叫你这样忙？”

他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阿兰喊他的声音就已经传到门外了。他忽然以“且听下回分解”的姿态，撇开一切应酬，冲进屋里来。他一见到阿兰就愣住了，好像不认识她。

“哎呀！你怎么忽然变得这样好看！”他惊讶地说，“是个迷人的少妇了！”

阿兰捅了他一把，说：

“不是少妇，是个母亲！快，来看我们的孩子。”

他们双双地走进房里，把我们扔在房外。我们只听见老刘又用惊讶的声音说：

“呀，小家伙真美！和你一样美，阿兰！他生得正是时候，他将不会挨饿，受欺侮，被压迫。他将会过着幸福的生活！”

“所以潘大叔给他取名叫‘快乐’。”阿兰说。

“这个我知道了，潘大叔已经告诉了我一切——这个名字起得好！”老刘说，接着他提高声音，像在朗诵一首诗似的，用感叹的调子继续说，“我将不再让他继承我的事业——当说书人，那是旧社会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出路时干的事。我们将送他上大学，学高级文化，学高级科学，他将成为国家的栋梁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级劳动者。啊，他出生的时代太好了！”

老刘的这番诗一般的独白，竟然把我的母亲的心也激励起来了。她兴奋地隔着墙喊：

“老刘，你说的什么呀？那么美好的字眼，多时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这个时代是怎么好法，快说说！”

老刘抱着孩子和阿兰双双走出来。他的眼睛直盯着胖墩墩的“快乐”，笑得简直离不开。我的母亲把孩子接过来，使得他能专心来回答我们的问题。

“络腮爷爷没有告诉过你们吗？”老刘说，“不，不，他不会告诉你们，因为他还不知道。工农民主政府昨天颁布了施政纲领，马上就要传达到各村，展开讨论，不折不扣地把纲领付诸实行。”

“怎么？成立了工农政府，还有施政纲领？”母亲惊奇地问，“什么纲领？”

“不是说过，施政纲领呀！”老刘说，于是他像说书时叙述一个故事的情节一样，用清晰的声调，一字一句地背诵：“实行土地革命，工农武装起来，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，建立工农政权；实行民主自由，改善劳苦群众生活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，增加工资；发展商业贸易，保护中小商人；拥护苏联社会主义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。”

老刘虽然咬字清楚，抑扬顿挫十分鲜明，但是我的母亲听了还是茫然。她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语：“工农民主政府，工农民主政府……我活这么大的年纪，还从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政府……”

“您自然不会听说过，妈，”老刘解释着说，“这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个由老百姓当家作主的政府呀。它的首脑不是皇帝或总统，而是主席，老百姓选出的主席，那就是潘旭东同志。它还有正式军队。妈，你知道农民自卫队现在改编成了民主政府的正规军呀——名叫第一军，大家公推潘载兴为军长，王建生是政委兼党代表。将来我们有了更多的枪支和子弹，还要编第二军，第三军……有了军队，政权就有保障了。政府马上还要分田地给

农民,孙中山提倡过的‘耕者有其田’,这次倒真的要兑现了。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,土地问题解决了,政权就巩固了,大同世界也就不远了。啊……”

老刘念到最后一句时声调忽然提高,但马上又降低,把这个“啊”字拖长,成为一个赞美式的感叹,好像他已经进入了“大同世界”。母亲虽然还不太理解这段赞辞的意义,但已经被他那充满激情的声调和咏叹所感动,惊呆得说不出话来。还是阿兰打破沉寂,说:

“形势发展得这样快,我已经远远落后了。老刘,我得到县里去,和你一道去!”

这时我的母亲才醒觉过来,大睁着眼睛,望着老刘,然后把视线掉向阿兰,盯着她那已经变得光平而又白润的面孔。

“不行!”她说,“没有满月不行!天大的事也不能叫孩子的健康受到损失!他不能没有奶吃。你们不是都说‘革命是为了下一代’么?”

对这个质问,老刘和阿兰都没有能够作出回答。他们低下了头,沉默起来。最后还是老刘说:

“阿兰,妈妈的话有道理。再说,工农民主政府现在正在忙着建立政权,建立军队和确定分配土地的方案;妇女工作还得留待后一步。你不要急,需要你的时候自然会通知你,安静过完满月吧。孩子不生病,我也可以更安心地干工作了——我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工作,不,甚至三个人的工作。你说行不行?”

阿兰那已经变成了白嫩的脸上浮出一个微笑。

“行!”她说。

“那么就这样定了!”老刘说,接着掉向我,继续说:“啊,我几乎忘掉了。何硕儒现在留在政府里工作,不再回这个村了,当然也不再需要你伺候了。王建生同志需要你,你得跟他一道工作。今晚就和我一道去!”

母亲刚才明亮起来的眼睛立刻又变得迷糊了,但是她没有再讲话。我、老刘和阿兰彼此静静地望了一眼,也没有讲话。母亲好像要逃避这种无端的沉默似的,以急促的脚步,走到灶房里去。她要为我们赶做晚饭,以便我可以早点起程,在第二天的工作开始以前,到工农民主政府去报到。

我们告别母亲和阿兰的时候,老刘发出一个勉强欢快的声音,说:

“妈,待工农民主政府的工作头绪清理以后,我接您到县城里去看看那

里的新气象,阿兰陪您同去——把我们的‘快乐’也带去。”

“是的,我们一定去,”阿兰说,“越早越好。”

只有我的母亲保持着沉默。她用双手在我脸上拂了一下——这个动作包含着无限的深情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话。

子仲叔住在县城一个篾匠铺临时腾出的一间房里。那里只有一张木床、一张旧桌和一个装文件的竹匣子。这里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,因为他已经被民主政府任命为临时办公室主任。我和老刘到县城的头一天就住在他那里。老刘虽然是宣传委员,但他的办公室只能是一张用四块木板拼成的小床,而这个小床他还得和何硕儒轮流交换着使用。我再也不能挤到他那里去了。

但子仲叔似乎希望我和他住一天。老刘把我带到他那里去的时候,天已经亮了,他已经起床了。他叫我趁被子还温暖的时候就赶快钻进去,好好睡一天觉,因为第二天还得执行紧急的任务。他自己则要开始这一天的工作——也是非常紧急的,一刻也不能耽搁。我只有按他的指示睡了——说实在的,跑了一夜的路,我也感到疲劳,需要睡一大觉。这一觉确实睡得不短,我醒来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。子仲叔刚从外面回来,样子很劳累,大概忙了一天,可能连饭都没有吃。他带回了两个焦干了的大饼。他啃起一个,另一个大饼给了我。

“这就是你今天的晚餐,”他说,“喝点水,饼在肚皮里发开,就会把肚皮填满——这张饼得顶到下午。”

他吃得很快,当然我吃得更快,因为我的牙齿好,而且也委实饿了。他咕咚咕咚对着茶壶嘴喝了几大口凉茶,就带着我去见王建生。这位新建的工农第一路军的政委,虽然面色因为睡眠不足而显得憔悴,但是精神却非常好。他见了我满面笑容,狠狠地在我肩上拍了一把,好像我们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。

“我们又要在了一起工作了,”他说,“你的那双快腿和记夜路的特殊本领,我们大家都非常欣赏——当然我是最欣赏的了。”

“又要我跑夜路吗?”我问——受到王建生高兴神情的感染,我的语调也变得轻松起来。

“子仲同志会告诉你。”他说,“总之,这两天还不需你到职。”于是他改换话题,用关切的口吻问:“杏嫂和小秃怎么样?他们想我吗?”

“你老不落家，他们母子俩已经习惯了。”我说，“他们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不要记挂。”

王建生向子仲叔斜望了一眼，意味深长地说：

“不要记挂是安慰话。虽然他们有葵花婶作伴，恐怕他们有时也不能不感到寂寞——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。我有时就免不了是这样，只不过过去工作太紧张，环境又恶劣，这种感情被挤掉罢了。”

子仲叔发出了一个微笑，说：

“呀，建生同志，你现在说真话了！”

王建生把嘴一努，用反驳的口吻说：

“难道我说过假话吗？究竟是人嘛。作为一个丈夫，一个父亲，我知道，我没有尽我应尽的责任。但现在有更大的责任在身，也只好这样。你说呢？”

子仲叔收敛起他的笑。

“我？”他说，“我们的处境不相上下。我现在还不能回家。好在葵花婶也像杏嫂一样，已经习惯于我们这样的丈夫了。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个时代……！”

这次轮到王建生发出微笑了。

“很快我们的生活就要走上正常化的轨道了，”他用平静的声音说，“不，所有庄稼人都要走上正常化的轨道——不然我们怎么建设新社会，建设社会主义？不过现在我们还得过一阵子不正常的生活——不正常就是为了正常，对吗？”

子仲叔点点头。

“对，”他说，“新阶段只不过刚开始，也许比前一个阶段还要更紧张。好，我们题外之话就谈到这里为止吧。春生这几天的工作完毕后，我就仍把他交给你，一定。”

我们三个人相互拍了拍肩膀就分手了。回到子仲叔的“办公室”兼睡房后，他倒了一大碗凉茶给我，权当做夜宵——他自己也这样做。在他开始夜间的工作以前，他又和我闲聊了几句：达生堂药店仍然在继续开业，由原看门的那个老头管理，他自己当然还得不时抽空去看看，因为药材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，店不能关——可能还更要发展。至于这次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队的一些领头人，现在都已正式参了军。

“你也算是参军了，”他在结束他的闲谈时说，“今后得严格听指挥，服从革命纪律。睡吧！明天大清早红苕来，潘大叔也会来。这就是你的新工作的开始，他们会告诉你做些什么。”

第二天天还没有太亮我就被几下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。子仲叔还在一盏油灯下面处理文件。他连忙把门拉开。潘大叔走进来，门外站着红苕——他仍挑着他那副跑信的担子，挤不进来。潘大叔递给我一个信封，说：

“这是潘旭东同志代表民主政府送给下边大城市省委的一份请示报告。他现在工作太忙，分不出身来亲自去。不能把什么重要文件都交给红苕同志携带。你也得分担他的一份责任，揣在怀里保管好。遇事小心，快去快回！”接着他又递给我一个小布袋，继续道：“这是你的干粮。”

我摸了一下，里面装的是几块烙饼。

“走吧！”红苕在门外催促着说。

子仲叔打了个哈欠，似乎已经支持不住疲劳的袭击。他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像是个没有感觉的人，吹灭油灯，和着衣服倒在床上，把我刚才盖过的被子拉到胸口上，潘大叔轻轻带上门，就和我们道别了。

走出城门以后，红苕打破沉寂，对我说：

“除了送那份报告外，我们还得到何硕儒同志家去。”

“去他家？”我惊讶地问，心里即时联想到了何硕儒的父亲及其一家人——我在他们面前忽然出现，那将怎样解释？“我不须陪你同去吧？”

“那怎么能行？”红苕说，“无论去哪里，我们俩必须同行！这是安全措施：如果一个人出事，另一个人知道，就可以及时通知组织。”

“那么我们怎么好意思去见他们？”我说，“我们扣留了他们的儿子，还向他们要了一些东西……”

“不仅要见他们，还要向他们要更多的东西——因为只有他们能做得得到，”红苕说，“而且我们还要在他们那里住几天，因为那里安全，比较保险。前几天我去大城市，就是住在他们家里的。”

“他们没有扣留你，或者向反动派报告？”

“相反，他们对我招待得很好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！”我说，“你有什么本事得到了他们的好感和信任？”

“不是我的本事，是他们的儿子何硕儒同志的本事，”红苕解释着说，“何